

林墨子：書法篆刻乃是大儒時尚

林墨子是本港著名的書法家、篆刻家，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在他看來，文藝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正是如此，他覺得書法篆刻是一種正能量，藝術家是要有所擔當，要能沉得住心，甘於寂寞，不浮躁，致力於劃時代的創作，真正弘揚民族文化；對香港未來的書法篆刻發展，他也向記者表露了期待般的心聲：持守傳統，不崇迷「創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受訪者供圖

書法篆刻，與中國的漢字文化息息相關。林墨子說，自己倡導港人學習書法，甚至篆刻藝術把字寫好就像對待自己的儀表一樣重要。他認為，漢字作為民族文化的承載工具，是歷史演化的血脈，所以藝術家有責任以各種方式保護好自己的傳統文化。

在書法中品味漢字之美

林墨子1971年出生在漳州一華僑書香門第，其父林斌龍乃是其啟蒙老師。他對記者說，自己的父親算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散文作家，也精通傳統書法。這種家學傳承，令到自已對書法篆刻的喜愛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日漸濃厚。他在概括自己的藝術風格時說，自身的書法篆隸之間，篆涉散氏盤、毛公鼎；隸擬三公山、石門頌，到天發神識碑，他都用心揣摩過。同時，他也喜歡碑帖兼融的清以來到民國間的流派代表書家，在林墨子看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漢字是中國的文字，是由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種文字組成，即古人所說的「六書」。文字的最初起源多數是由圖畫象形文字演化而來，在形成的過程中再加以語境聯想拓展組合，進一步形成多義字形。所以林墨子覺得漢字溯源到殷墟甲骨文就會發現很多字象形程度極高，多為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而象形文字正源於生活，源於自然萬物。所以自古以來就有字畫同源的說法，最早的圖畫文字逐漸由圖案化的形象符號演變為由線條構成的文字，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神奇瑰麗的書法藝術。

不過，對於當前藝術界流行的「創新」，林墨子並不認同。他對記者表示，學習傳統書法篆刻還是需要師承，特別現在西方教育和外來視覺圖式構成的植入和影響，往往會讓年輕一代誤認為書法就是寫字，橫塗豎抹肆無忌憚以圖式張力來塗鴉和繪製，打着「創新一族」的口號，實際上已去傳統甚遠，甚至可以看出是一種以漢字為素材的行為表演，這已經和傳統文人書法講究的精氣神相背離。他進一步解釋道，實際上，失去法度就沒有廟堂之氣，就登不了大雅之堂；文人書法講究「師造化」、「師心源」和「師傳統」，中國書法在過去，一直是文人經營的藝術，它有很多好的傳統，也有很深的哲學意味，這些傳統不能輕易丟棄。

任何一樣藝術都有她的審美準則和標準，林墨子說。他認為，書法講究法度，講究骨法用筆，利用毛筆的彈性提、按、擒、縱、使、轉、頓、挫，八面出鋒；趙子昂說「用筆千古不易」，是對筆法重要性的高度強調。故而，林墨子覺得，書法之用筆博大精深，但所謂法度就是規範，規矩，是一種大美，是一種廟堂氣而



■林墨子

不是野狐禪：天地無心，但天地的精華聚於人類，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聰明才智使他能夠代天地立心；這更進一步闡明了書法乃萬象參自然萬物造化的一種意境。書法藝術如此，篆刻藝術也是如此。

篆刻彰顯民族特質

中國本就是以大禮之邦，李克強總理在米蘭送給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的禮物，用壽山石為二人篆刻的中文名印章——這是林墨子對記者闡述篆刻重要性時舉的例子。他說，千里送印章，禮輕情意重，一枚印章承載着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友誼；物質承載文化，文化體現價值，這就是文化的魅力。林墨子表示，印者信也——在古代，印章是職位官銜最為重要的一種信物，是一種權力的象徵，一方面用來傳達政令，實施策令，另一方面用來顯示國家主權所在，是權力行使的重要標誌。而在當代，林墨子則認為，印章不單只是持信之物，它更昇華成一種大儒時尚，一種民族自豪，一種貴族文化身份的象徵。感受時代人文魅力，因為它以人為本，意義非凡；同時品味壽山石篆刻大美不言，因為它吉祥潤澤，厚德千秋。因此，壽山石印章作為文化禮品的首選將彰顯着不朽的傳奇。

文藝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正是如此，這是一種正能量，林墨子坦言藝術家是要有所擔當的。他概括地表示，當代書法創作存在着取法經典與取法民間兩種創作取向——民間書法如寫經、墓誌、漢簡、帛書等書法資源在當代受到一部分書家的關注和追捧，但更多的書家是在學習和借鑒經典。不過，他認為，所謂的民間書法是相對於經典書法而言的，也就是泛指經典之外的一些書跡：這些書跡在法度、規範、精純等方面難與經典書法抗衡。

不過，林墨子也坦言，古代民間藝人



■言忠信行篤靜

■創作中



的「樸拙」與「天趣」更見性情，在逐漸影響着人們的審美取向；民間書風與經典書風是一種對應的關係而不是相互對立，並不是尊崇經典就要鄙視民間，推崇民間就要貶低經典，這是一種可以互相滲透摻和的。因此，林墨子建議，青年書家在書風的追求上可以適當的相互借鑒和學習，將會使創作相得益彰，假古出新，嫣然有味。

放眼未來的香港書法

林墨子對記者表示，在他的角度看，香港政府對藝術發展整體還是支持的。他覺得應該要拓展香港天時、地利、人和的資源，通過大型文博展覽，學術研討進一步推動本土文化；同時應該贊助和扶持本港一些有才華的年輕學子專心致力於文化學術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研究，讓他們摒棄後顧之憂，可以更好更專心的做好學術作品，拿出最佳成績。

愈是科技進步，漢字書寫愈彰其貴，這是林墨子的

感受。他主張，香港的小學就應該推動書法課，掌握毛筆的正常書寫，加強國學方面的修養，獎掖後學；每年可以由藝術發展局或相關機構贊助倡導和主辦書法比賽，挖掘書壇新人加以培養，並推薦加入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以期更大的鼓勵；同時，藝術發展局或者民間財團也可以設立文化類獎學金或展覽機構為後援贊助商。

如是，在林墨子眼中，則香港書法大有可為之前途。



■日利



■飲太和



■宜子孫

重慶王琦美術博物館開館 傳承中國版畫藝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渝中區中山四路是著名的抗戰文化一條街，這條街上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家巖50號周公館、桂园以及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國共重慶談判舊址等。日前，中山四路又增添了一筆文化亮點。以新中國版畫藝術奠基人之一，以當代著名美術家王琦命名的王琦美術博物館在中山四路75號開館。該館藏有王琦創作和他收藏的700餘件木刻版畫作品、書畫和文獻資料。

在開館儀式上，98歲的王琦由於身體原因沒有出席。他的長子、今年73歲的中國版畫院院長王煒十分忙碌，「終於實現父親的願望了！」他激動地告訴記者。

王煒介紹，王琦生於四川宜賓，但從小在重慶生長，「山城的坡坎坎對他再熟悉不過了。」王琦16歲進入上海美術，第一次離開重慶。畢業後輾轉重慶、武漢、延安，最終又回到了重慶老家，那年是1939年，也是抗戰最艱辛的時候。

由於木刻造價便宜，還可複製，所以抗戰時期非常流行。這一時期，新興木刻版畫出現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和以延安為中心的邊區，成為一場抗日救亡的藝術運動，也被稱為「刀尖上的藝術」。資料顯示，1942年至1945年間，是抗戰木刻運動最輝煌的時候，當時重慶的雜誌、報紙都設有版畫副刊，老百姓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版畫，對抗戰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王琦的第一幅木刻版畫作品《活躍於冰天雪地中的我游擊隊》在《新華日報》刊載，版畫上3名游擊隊戰士在冰天雪地裡背着槍，眺望着遠方，黑白分明的線條表現了游擊隊戰士抗戰的艱辛。對重慶在抗戰中的現實刻畫是王琦作品中最常見的。《野蠻的屠殺》、《警報解除以後》、《石工》、《嘉陵江上》等等，都是父親以重慶大後方為背景創作的，這也是父親的代表作品。」



■王琦美術博物館揭牌



■王琦美術博物館剛一開館就有市民急不及待的進館參觀拍照。

王煒說，在重慶的10年，是父親創作的高峰期。1989年，王琦在版畫《運河碼頭》之後封刀，開始了水墨畫和書法的創作。「原因是歲數大了，加上視網膜脫落。」王煒說。在晚年的水墨畫裡，王琦眷念的還是重慶的山山水水。在四樓的展廳裡，陳列着王琦晚年的水墨畫作：巫溪《大寧河》、《峽江攬勝》等三峽題材的系列畫作無不流露出作者對故鄉的熱愛。

中國書法交流活動 在聯合國舉行

新華社電一場別開生面的中國書法交流活動日前在聯合國舉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書法為各國人們相互理解與欣賞架起了橋樑。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章啟月、潘基文及夫人柳淳澤、聯合國副秘書長金垣洙及聯合國國際學校的書法愛好者約80人參加了活動。

潘基文在致辭中說，書法是世界上最古老和偉大的傳統藝術之一，通過優雅的線條與生動的結構向全世界傳遞着東方哲學思想，為各國人們相互理解與欣賞架起了橋樑。聯合國有眾多書法愛好者，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員。在多年研習書法過程中，他親身感受到掌握這門藝術並非易事，而一旦學好書法將會使人受益良多。相信書法藝術將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和喜愛。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在致辭中說，書法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寶。書法博大精深，凝聚智慧，承載着中國哲學思想走上世界舞台，在國際交流中推動着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劉結一說，潘基文秘書長書寫的「上善若水」即是一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卻塑造了山川、大地。希望書法及其承載的智慧為促進聯合國事業發展繼續發揮獨特作用。

本次書法交流活動中，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曾來德以「墨樂」的概念向與會嘉賓介紹了書法與西方藝術的相通性，聯合國秘書處官員介紹了學習書法的心得體會，聯合國國際學校的學生展示了他們的書法作品。



■交流活動現場